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引发的论争

胡金平

［摘　要］ 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小学教育知识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教育知识观从知识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转向，也体现为教科书文体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同时还表现为教育知识取向从实用向人文性方面的转轨。无论哪一种转型，都引发了不同群体的批评。这种基于各自立场的批评与反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待教育知识转型过程中“经典”与“通俗”、“实用”与“人文”、“文化”与“兴趣”之间不同取向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 五四运动；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观点论争

在文化学术界，五四运动向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五月四日当日爆发的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5年《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的创刊至1927年国民革命胜利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①本文主要就广义的五四而论。广义的五四运动，有时又被学者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引发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等发生剧烈变革的大事件，其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在诸多教育史教材或研究著作中，论及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对于教育观念、教育知识转型的影响，更多地似乎是将其描绘为一场“摧枯拉朽”、众口一词的转型变革，即使偶尔提及反对意见，也多以“保守派”“守旧派”等“污名化”方式加以处理，恰恰忽略了教育知识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本文目的旨在通过梳理五四时期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过程中，基于不同立场、不同群体的知识人对于当时发生的教育知识转型的态度，呈现多元、复杂的思想碰撞，且从不同视角对于在五四特殊语境下发生的一些教育变革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教育知识观的转型：从知识本位转向儿童本位

所谓教育知识观，是指对教育知识性质的认识。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知识观是强调教育知识的经典性、政治性与伦理性。政治性与伦理性自不待言，所谓经典性，是指教育知识地位的权威性、神圣性，以及价值的永恒性和超越性。这种对于教育知识经典性的强调，在西方教育知识观中同样存在，因为通过学校教育完成儿童的“社会化”似乎是近代中外学者的教育共识。

胡金平，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①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59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教育知识第二次转型的重要标识是教育知识观的变革。作为一场引发了十余年的思想政治与文化启蒙运动，对于教育知识观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于原教育知识的取向、地位、类型等的颠覆。

虽然关于“何为知识”、“何种知识最有价值”一类教育知识观的回答古今不一，但中国自古以来向以“知识本位”为教材编撰的取向。清末虽然已经关注儿童，但在教材编选方面强调的仍以满足成人生活需要为目的。民国国体有变，但此时出版的教材尤其是小学教材之中，其编撰的主导思想依然信守“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传递的“知识”就是成人眼里完成儿童社会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如由汪渤、何振武编辑、中华书局1912年出版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体现资产阶级的教育宗旨，第四册第一课选编了章太炎的《说自由》，第五册第一课编选了《共和国政治》，以培养儿童民主共和思想；又为体现“注重实利教育”的教育宗旨和顺应“实业救国”的呼声，选编了《葡萄酿酒》《风雨表》《寒暑表》《铁路》《昆虫之农工业》等与实业教育有关的知识。为了凸显教材的经典性、权威性，这个时期的教材还特别注意名家名篇尤其是传统经典作品的选录，如汪渤、何振武编辑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选编了戴名世的《鸟说》《意园记》《醉乡记》《睡乡记》，方孝孺的《越巫》，陆游的《军中杂歌》，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等。又如，由北京教育图书社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实用国文教科书》（高小用），第二册选录的课文几乎均为经典名篇，诸如元代刘因的《高林孔子庙记》，宋代黄庭坚的《与王立之书》、程颐的《养鱼说》、欧阳修的《养鱼记》、苏轼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明代刘基的《虞孚》，清代彭端淑的《为学》等。

处于新旧社会之交的教科书编撰者们，在教材内容编选方面，一方面努力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将一些反映时代精神、认知国体政体的内容编入教材，另一方面注重知识的经典性和权威性，关注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然而这种强调教育知识的“社会性”、“知识性”、“经典性”，忽视儿童特点与儿童生活需要的教材编写思想，在民国初年便受到深受现代欧美儿童主义思想影响人士的批评。民国初年，蔡元培在临时教育会议上便提出教育应立于儿童的地位。教育家俞子夷亦主张：儿童是教育的对象，学校内设施、教员的工作都是为儿童服务的，“学校内学童之地位当若何？曰当为学校之中心也。为学校中心之学童，为现在之儿童乎？为将来之成人乎？此吾人所急当研究之问题也。”①1916年耕莘在《学习法之刷新》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小学校教授上实情，既不认儿童为本位，故历来关于教授之方法，普通但称为教授法，而不称学习法……所谓教师本位及教科书本位，全为教育误点，不可不急行纠正之者也。”②

不过，真正引发教育知识向儿童本位转型的动因，更多地是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流行的民主主义、个性主义、儿童中心主义指引下对“儿童的发现”或新儿童观的流行。从教育知识性质的变迁看，是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劳工神圣”等平等观念下“小传统”的边缘知识向教育中心发生位移的投射。

所谓儿童本位的教育知识观，是指从儿童的立场、视角、兴趣取舍教育知识，教育知识的选择、组织应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经验生活。一如教育家吴研因所言：“儿童本位教育的解释，不过以儿童为施教的主体，取客观的态度对儿童：在积极方面，视其发育的程序，本身的需要，‘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使其能承受或满足；在消极方面，不以成人的好恶强迫儿童承受，因教师的技术粗劣而摧毁儿童的身心，或因社会一时的需要而期其早熟，以缩短儿童建筑做人的基础的历程罢了。”③

伴随着儿童本位主义新儿童教育观的广为提倡，1923年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主导，集合各地众多专家编制而成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得以试行。这次课程编制“一变往日以成人为本的观点，而倾向于儿童本位。处处顾及儿童的生活、兴趣、能力和需要，并根据学习心理的研究结果，而指示组织教材运

①俞子夷：《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研究之根本问题》（续），《教育杂志》1915年第7卷第3号。
②耕莘：《学习法之刷新》，《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5卷第1期。
③吴研因：《儿童年与儿童教育》，《教与学》1935年第1卷第3期。

用教法的要点”。[①]自此，教材编写的儿童本位获得了法理的支持。

基于儿童本位的教育知识观，在教科书编选方面便是凸显儿童自身的需要，将“儿童文学”或“儿童的文学”置于教科书的重要位置。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最早鼓吹儿童文学价值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20年10月，他应邀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演讲，提出了具有儿童本位主义鲜明特质的文学教育观：“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这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种食料，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改革，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②]周作人在演讲中不仅为儿歌、童话等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正名，同时对假借“儿童将来生活的需要”的名义编写的成人本位和知识本位教科书进行了批评，就像其他学者所描写的：“国文一科，差不多‘包罗万象’，实科材料，居其十分之八九……什么萝卜青菜土瓦木石，一方面说虽很切实用生活；但这实用生活，并不是儿童本身的日用生活，不过教师成人，觉得以为是实用生活的材料罢了；枯窘乏味，机械呆木，足以阻杀感情，窒塞想象，令人讨厌想逃学。”[③]

周作人的演讲词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借着《新青年》的强大影响力，儿童文学很快风靡全国，成为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新鲜和乐意鼓吹的新事物。[④]例如1921年7月，严既澄在《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演讲中，认为：“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他所包涵的，是童谣，童话，故事，戏剧等类，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的东西……人生在小学的时期内，他的内部生命，对于现世，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只有儿童的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缺的精神上的食料。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着重这儿童文学。”[⑤]1922年，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写道：“儿童文学无论其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者，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⑥]

恰是因应了儿童本位教育知识观的流行和儿童文学的提倡，在1920年代后大多数教科书编撰者们均重视“通过儿童眼睛看世界”，例如1923年由庄适、吴研因、沈圻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小用），八册内容大多与儿童生活有关，尤以小动物为角色的动物故事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比例，尤其第一册50篇课文中，有超过一半的课文与小动物有关，如《大狗小狗》《大鸟小鸟》《老羊小羊》《公鸡》《黑猫》《老鼠呀》等。同时，教材编选注意课文生动活泼、合儿童兴趣，如教材第一册第40课《欢喜》：“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虫一把米。羊欢喜，四面都是青草地。人欢喜，五个朋友在一起。”语句朗朗上口，充满童趣，满眼的儿童的世界。又如1924-1925年由黎锦熙、陆费逵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读本》（初小用），以儿童文学为主，注重童趣和生活性，如第4册的《多了一根骨头》以儿童思维方式来写：“先生说：‘人的身体上，一共有二百零八根骨头。’一个学生说：‘我有二百零九根。’教师忙问：‘什么理由？’学生说：‘昨天吃饭，咽了一根鱼骨头下去了。’”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该教材同样注意以小动物为主角的动物故事的编选，体裁多样，涉及儿童故事、童话、童谣、儿歌、谜语等。例如第二册的《花和蝴蝶》《猫捉老鼠》《我家的狗》，第三册的《老虎叫门》《马和驴》《小公鸡》《两只羊》《谜语》等。

不过，当基于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成为国语教科书主体，“鸟言兽语”“神仙故事”入选小学教材之后，便引起了学术界的论争。争论的核心焦点是教育知识的主旨是“激趣”抑或“教化”，即“社会化”与“儿

①陈侠：《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②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号。
③《江苏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第七次会议报告（续）》，《新教育》1920年第3卷第5期。
④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⑤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教育杂志》1921年第13卷第11期。
⑥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杂志》1921年第2卷第4号。

童化”孰重孰轻。例如奉天的桂承荣在给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提交的议案中，便质疑以儿童文学为主的教科书的知识价值问题，他甚至认为课文中的“小兔子开铺子”兽语与他家乡小孩骂人的脏话一样粗鄙，故其教科书一文不值。①常熟学者孙雄从强调教材的教化功能立场出发，认为：“吾国蒙童入塾，向读王伯厚《三字经》，其开宗明义云：人之初性本善。此六字所涵义蕴，何等精深远大。二十年来，主持教育者率诋旧时经籍为顽固，改用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教科书。其最先教数课有云：大狗叫，小狗跳。他公司与之争利，亦编有蒙学课本，易之曰：大猫跑，小猫追。蒙养为作圣之基，今乃以此为家弦户诵之本。宜乎率兽食人，盈城盈野，纵有位育经纶之儒者，其奈此跳踉追逐之猫犬何哉？”②在新学制时期，尽管吴研因起草的《国语课程纲要草案说明书》中提出教科书内容可含有神话仙人故事，妖怪故事，但仍有学者存有非议，坚持认为“编辑小学教科，宜采用古今事实，不得多用假托，以免儿童生不信仰之心。”③著名学者罗廷光亦对《新学制课程纲要》中提及的“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的规定不以为然，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提出质疑，他说：“我们始终不相信：所谓儿童文学，仅不过是如近日教科书中所有的些‘猪叫’，‘口技’，‘狐狸怕狗’，‘鹿吓老虎’……一类的东西；我们更不相信：只有荒诞不经的神仙故事，才能适合儿童口味，才能引起儿童兴趣。”④这种反对“鸟言兽语”“神仙故事”进入教材的论争一直延续至1930年代。

中小学教科书应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进行编撰，顾及儿童兴趣和生活需要本是教育的应有之义，然而一味提及儿童的接受力，同样存在拉低学生语文水平的危险。如何平衡教材的“教育性”、“知识性”与“趣味性”、“儿童性”之间关系，至今依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教材文体的转型：从“文”到“语”引发的论争

伴随着近代西方学术的大量传入，晚清时发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知识（包括教育知识）的转型，即一些论者所言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向，是从中国传统教育知识体系向西学近代教育知识体系的转向。这次转型，随着清末教育改革和《癸卯学制》的颁行而初步完成。

民国之后，在国体变更的同时，教育观念、教育话语、教育知识发生了第二次转型。其中教材文体转型，是近代第二次教育知识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

虽然就文体而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言文相合的现象（如《论语》、《孟子》之类），但随着后世语言与文字的分离，读书、作文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由此也有了文言文与俗语或白话文的对指。所谓“白话文”，即口语化文字，其起于何时，由于时代变迁、标准不一，学者并无定论，不过，宋明时期一些著名教育家如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明代王守仁的《传习录》等已具有相当明显的口语化行文特征。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基于“开民智”的考量，自19世纪末便有部分有识之士在“言文合一”主张下，揭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⑤如梁启超从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以及言文分离所造成的弊端分析入手，提倡以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形式教育孩童和民众，主张以歌谣、俗语、俚语等为教材，使受教育对象易于理解教材内容，不再以读书为难事。⑥被称为“梁溪七子”之一的无锡人裘廷梁1898年在《苏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在这篇系统宣传白话文的代表作中，作者将文言文与愚民祸国联系在一起，视白话文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他创办的《无锡白话报》、编印的《白话丛书》，以及组织的“白话学会”在提倡白话文方面曾发挥过重要影响。事实上在清末新政时期，利用发行白话文报开展民众教

①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②孙雄：《旧京诗文存》，转自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3页。
③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第141页。
④罗廷光：《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课程问题》，《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15卷第2期。
⑤高时良：《中国教育史论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8-234页。

育、社会教育是当时较为通行的做法，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发行的白话文报刊达百余种之多。

虽然自清末以还白话文的宣传和使用从未中断过，但其主要指向社会教育层面，即对象主要是社会下层百姓。白话文真正进入学校教育知识系统，成为中小学官方认定教材的公认文体，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教育知识转型的顺利完成，主要得之于这个时期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大环境。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最初是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开始。而所谓文学改良主要便是提倡白话文体。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不避俗字俗语”视为文学改良的入手之一，公开宣称以施耐庵、曹雪芹等所撰通俗文学为文学正宗，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并不同于之前的白话文提倡者，而是主张将白话文引入各社会阶层包括学术研究之中，“提倡国语的文学，把白话作为求高等文化、高等知识的媒介；一切讲义咧、演讲、报纸、杂志咧，都改用白话。”②胡适的观点得到了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新派人物的大力支持。1919年11月，蔡元培在给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作演讲中便指出：“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③白话文提倡者一般是赋予了白话文三方面价值：顺应时势、普及教育、反对复古。尽管在此过程中，遭到了林琴南等人的非议，但新派人物借助报刊杂志、演讲等唤醒大批热血青年，初步完成了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进入教育知识系统合法性社会环境的营造。

不过，真正促使白话文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中小学教材的，是借助政府力量，通过官方和半官方主持开展的国语运动而完成该项转型。1921年，胡适在《国语运动的历史》演讲中也承认：“政府是一种工具，就把国语来讲，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一定要靠政府来做。”④

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语统一”，即通过注音字母等完成汉字读音的统一，二是“言文一致”，即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书面语。

民国初年，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1919年，由教育部召集“国语统一”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北京大学代表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人提出了三件提案，其中《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中要求改编小学课本，因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语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一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文，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⑤该提案获得政府认可，1920年，教育部通令从本年秋季开始国民学校全用国语教授，高等小学国语与国文参合教授。1921年教育部发布训令：“凡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提案议决函请教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教育部复函表示同意。

白话文代替文言成为教材文体，是影响中小学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事件，一二十年后，小学教育家吴研因依然认为：“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教育部的提倡不过是促其速成罢了。教育部即使不提倡，这趋势也一定自然会来的……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的结果，是小学儿童读书的能力，确实增进了许多。”⑥

然而，虽然借助政府力量初步完成了教科书文体的白话文转向，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界对此没有争

---

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
②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白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③蔡元培：《国文之将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7页。
④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教育杂志》1921年第13卷第11期。
⑤钱玄同等：《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4号。
⑥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11期。

议，尤其是面对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那些过于激进的“打倒古文”、“废除文言”一类口号。事实上，虽然大多数学者对于白话文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并不否认，但对于国语进入中小学教材的合理性或者教材的国语与文言的比例关系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至后来始终存在着争议。

批评者的立场观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白话文进入中小学教材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文言文有着白话文所没有的“典雅”，“白话的文太繁秽，不如文言的文简洁；白话的文太刻露，不如文言的文含蓄。所以白话的文是毫无趣味的。”又有人说：“白话的文，今天看了一览无余，明天就丢掉了，断不能垂诸久远。文言的文，色泽又美，声音又好听，使人日日读之不厌……古人的文章所以能千古不朽者，就是用文言的缘故。所以我们雅人只要学古，白话的文由他们俗人作通俗文用罢了。”①无疑，言者是基于精英主义立场颂扬文言文所具有的所谓“贵族性”和审美价值。当时持有这种观点者并不在少数，如学者刘咸炘同样反对白话文进入教材，认为白话文“乃所以教民，而非教士，可为辅而不可为主。若遍授学僮，代去文言，则将来难通古书，自失先人遗产，学何以进？”②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个时期一些用白话写就的课文在“雅”等审美方面存在不足却是不争事实。

另一类是主张白话文与文言文各有其价值，故中小学教材的选文尤其在白话文成为“显学”的热潮中，应注重文言文特有的价值和地位，这是批评者的大多数。例如早在1919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陆费逵便认为文言有其独特的价值：“学校固然应当教授国语，但不可全用白话，丢了文言。因为有许多意思，不是白话能表达得出的。我国的国粹，更是非从文字入手不可的。况且我国现在的文言与白话，离开的太远。白话太不文明，定要取浅易的文字来改良白话。口里说的话，还要文来改良，笔下写的，不能全离了文，那是更不必说了。”③在陆费逵看来，话（语）与文是不同的，口语落实成文字仍需要进行“文”的修饰，“就是白话文，也要检点，不可太粗、太俗、太陋。我对语言文字的意见，是要语言渐高尚，文字渐平易，求他一致。”陆氏的这个观点与10年后刘咸炘的看法不谋而合，后者也认为：“学校课规以语为初基，仍以文为进级，然初止学语，文基已失，加以恶深乐易，能通文者必日希，将使学术之源不在巨著鸿编而在杂志小报，以言普教，吾见其降教而已。”又说：“若课文能通俗，平民易知，举其大概，非必严画，此固可通，然遂以通俗易知为文之贵，则有不然。既名为文，即有艺术，虽至质白，不能有异。蒸民鉴赏之力，绝不齐同。周作人尝言：‘文学本带有贵族性。’此觉悟之言也。”④在刘氏看来，中小学教材过于追求通俗易懂，将会导致中小学国语或国文水平的降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白话文教材进行批评者，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事实上，如陆费逵便是一位思想开明者，早在1909年便倡导语言文字改革，发表了《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民国初年，又曾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等。可见，启蒙者简单地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污名化的方式指斥肯定文言文的教育价值者，并不符合事实。

三、教育知识功能的诉求：实用与人文之间的论争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导致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教育知识的地位被颠覆、价值被质疑，相反西方以科学、实用为特征的教育知识成为人们救国的重要手段。1908年，钱玄同在日记中写下了刘师培之言：“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故“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⑤

民国建立之后，新政府在强调以共和精神改造旧时教育之时，依然承袭了晚清“尚实”的教育内

①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
②刘咸炘：《语文平议》，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③陆费逵：《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中华教育界》1919年第8卷第1期。
④刘咸炘：《语文平议》，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第77-81页。
⑤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容，并将其作为民国教育方针的内容之一，只不过易以“实利”一词而已。简言之，在民国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实用（实利）”是判断教育知识真假、好坏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亦是这个时期教科书编写的重要原则之一。1912年，陆费逵有感于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发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强调我国的大患在贫穷，教育上采实利主义是对症下药之举。陆氏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观点引起了教育界诸多学者的共鸣，如1913年，有人便依据《小学校令》认为：“《小学校令》第一条明白曰‘授以生活必须之普通智识技能’，此生活必须之普通智识技能一语，即根乎实用主义之要求而来者也。故教授不切实用，则小学校失其教育之价值。”①同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中更具体提出：“（国文）读本材料，全取实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记物，置实物于前为题，或令写景），尤多作书函（正式书函，便函，通告书均备），或拟电报（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电报价目表等。旧日《宦乡要则》，今之《官商快览》，以及坊间印授之日记册，附载各种，实包有无数适用于应用之好材料）习写各种契约式。书法注重行书。”②著名教育家贾丰臻对黄炎培的观点深以为然，1917年，他在《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一文中便认为：“读法除国文教科书外，亦多选读短篇之记事文，而论说词章不与焉，此外所当阅看者，如新闻、杂志、广告、发票、收据、契纸、借据、书信、邮片、公文、告示等，均当注意。”③1919年，他在《阅北代表扩充全国教育计划书》中依然重申了这个观点。

不仅学者们以“实用”为改造教育的不二良方，同样教科书出版商亦以此相标榜，如1917年商务印书馆在与《共和国新国文》配套的《共和国新国文教案》中特别标明：旨趣是“以儿童出校后必须之知识为主，籍立将来独立营生之基地。”

简而言之，“实用”是民国初年流行一时的教育话语，以致有人感慨：“近世教育潮流，非趋重实用主义乎？研究教育家提倡于前，实施教育家声应于后，于是教材取实用，学科重实用，教授方法亦渐次趋合于‘实用’二字，此非教育界之好现象乎？察各地学校，自‘实用主义’四字出现以来，几有春风一到繁华便增之概。”④

不过，教育知识的过于“实用主义”化，当时便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人们对于以国语科实用化后导致人文缺失的忧虑。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基于人文立场的忧虑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教科书“传道”“教做人”功能弱化的不满，另一种则是对国语教科书由此带来的文学性减少、审美功能被忽略、学习者阅读兴趣丧失的担心。

从关注教育的“传道”“做人”功能计，1916年，章太炎便对当时学校教育现状甚为不满：“自新教育潮流输入，亦复守其故说，纳一切学术于书本。师以是教，弟以是率，而不知教育之为道，正不尔尔。盖教育家，非能教人育人，在能使人自教育而已，彼以书本为教育，实属大谬。教育事业，精神事业也。”⑤也有学者对教科书一味操弄富强、功利、实用名词深为不满，认为：“试观今日学校中所授之修身及伦理学教科书……以土地私有、贫富不均为万世所不易；更有国家神圣，法律万能种种呓语，使理性未充足之少年，习闻此等邪说，其将来不为正义之道之敌者，亦几希矣。”⑥直至1930年代，学者潘光旦对现代教育丢失“做人”的中国教育传统精神做法依然表示出忧虑，他说：“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和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

①王朝阳：《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研究》，《教育研究》（江苏省教育学会）1913年第8期。
②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11月号。
③贾丰臻：《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教育杂志》1917年第9卷第1期。
④张显光：《实用主义潮流中之作文教授》，《教育杂志》1917年第9卷第8期。
⑤《黄炎培日记》第1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73页。

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①

其次，从国语学科特有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出发，批评“实用化”教科书实际成为一种“无人”“无趣”的冰冷知识的陈列，例如在1921年，太玄便著文指出国语教科书过于实用化的问题：“我国之国语读本中，非文学化之实科教材，触目皆是。例如《稻》《麦》《动物与植物》《气象与天气预报》等之教材，皆全然非文学化者也。又如高小读本所采择之《道路》《租屋契约》《商标》《行政系统》《信教自由》等教材，更无全文学的要素。如斯之教材，欲其引起儿童之兴味，不啻缘木求鱼，此所以教授之效绩终不可得而见也。”②陆费逵虽然是教科书实用化的倡导者之一，但在1919年《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一文中，仍借德国经验，提出读本的材料应有三个标准，即实用的、美的、国粹的。

过度实用化教材给实际教学带来的危害，令人记忆深刻。国语教科书编撰专家魏冰心1940年代后期曾回忆：“民国初年，江浙各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及比较前进的小学见于坊间编印的初小国语教科书，编选既无标准，内容更少兴趣，题材虽多采用常识，而体裁为千篇一律的说明文。使儿童阅读枯燥无味的说明文，充其量不过能识字读书，而不能培养其阅读兴趣，增进其阅读能力。至所获得的常识一鳞半爪，一知半解，毫无系统，不切实用。”③

“实用”与“人文”的论争，其实就是今天语文学科功能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问题，至今其依然是教育实践中需要认真处理的一对关系。

面对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小学教育知识的第二次转型，虽然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文化立场对于这种转型保有各自不同的态度，并引发论争，但无论是批评还是被批评，都是各自教育知识主张的表达，体现了民国学人对教育知识问题的思考。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Discussions on the Educational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fluenced by May Fourth Movement

HU Jinping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riggered the second-round educational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kind of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the shift in the view on educational knowledge from knowledge-centeredness to children-centeredness, but also the change in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textbook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vernacular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the third change is that the knowledge taught in schools changed from practical to humanistic areas. Any of the transitions caused criticisms from different groups. The criticisms and counter-criticism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reflec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lassic and the popular orientations; between the practical and the humanistic orientations; and between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the orientation for personal interest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ducational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rgument

About the author: HU Jinping,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

---

①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126页。
②太玄：《最近读法教授之进步》，《教育杂志》1921年第13卷第2期。
③魏冰心：《小学常识课程之演变与简化》，《教育通讯》1948年复刊第5卷第4期。